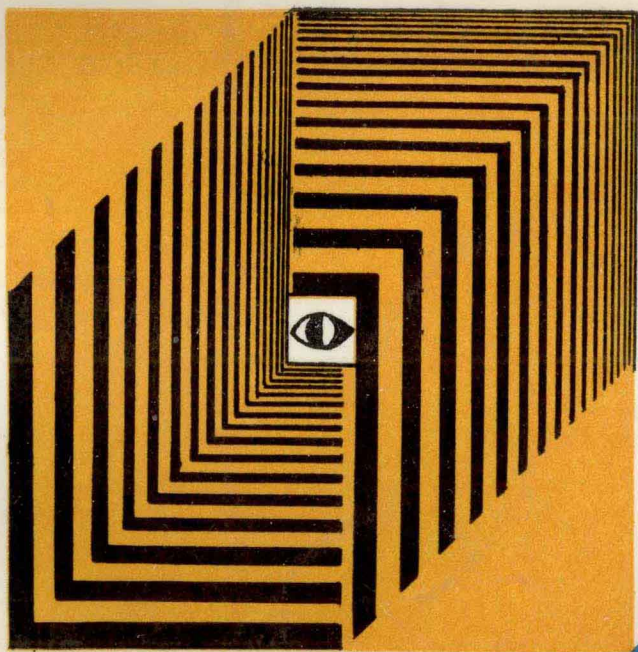


西方人

看西方

陈先奎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 西方人看西方

陈先奎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年·福州

闽新登字01号

西方人看西方

陈先奎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2.25印张 4插页 290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11-01740-6

C·35 定价·4.60元

## 序 言

现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时的资本主义相比，其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现象。对现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的任务，又一次突出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正确地认识现当代资本主义，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写出有科学分析的论著；也需要开拓思路，放开眼界，了解西方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认识与分析。许多西方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分析尽管有种种局限，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深度与认识水平，但对我们全面认识现当代资本主义却仍然不无裨益。

本书围绕现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者、经济学者、法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以及文艺评论家关于资本主义的有关论述组织材料，介绍他们对现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与分析；通过他们的现身说法，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分析现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一些启示。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认识西方现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即是我们对现当代西方思想理论界的一种认识。

除很少几个学者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本书介绍的西方学者大多对西方资本主义持肯定的态度，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学者，而且俨然以替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论证与辩护为使。但即使如此，从他们所表达的内心困扰、思想矛盾及其对资

本主义的某些局部的否定性反思来看，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散布的种种美化资本主义的无稽之谈，种种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骗人“神话”，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何况我们还可由此丰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呢？

以上所述，也是我们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的地方。

本书各章的编撰者分别如下：

序言，陈先奎；第一章，陈先奎，高自龙；第二章，顾海良；第三章，王晓升，伍义林；第四章，史彤彪，陈先云；第五章，辛向阳；第六章，吴波；第七章，郝立新，胡邦胜；第八章，秦轩。全书由陈先奎统稿定稿。

本书的写作主题由我的老师吴建国所惠，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他的热情指导与点拨；中国人民大学的奚广庆教授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俞金树、王有千、王开彬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陈先奎

一九九一年夏于北京

# 目 录

序言	( 1 )
第一章 困扰民主制度的幽灵	( 1 )
○领袖民主与科层统治	( 2 )
○多数统治还是精英民主	( 10 )
○分散自治与集中控制	( 14 )
○金钱操纵抑或真正的民主	( 20 )
○民主始终优先吗	( 36 )
○个人自由与国家干涉	( 47 )
○效益与正义	( 54 )
○当代西方的未来 民主观	( 64 )
第二章 摇曳在繁荣与萧条背后的死光	( 76 )
○告别繁荣：“凯恩斯时代”的终结	( 76 )
○增长年代的衰落：罗宾逊对西方经济现状的反 思	( 85 )
○布满陷阱的“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思对西方经济 结构、制度的剖析	( 96 )
○寻求摆脱困境的“创新之路”：对“熊彼特时代” 的期待	( 105 )
○无可挽回的衰落与崩溃：激进学派对西方经济现状 与前景的思考	( 115 )

第三章 智慧之学的迷惘	(127)
○孤独苦闷的自我	(128)
○现代人人格的精神分析	(141)
○迷惘的伦理观念	(150)
○贫困的科学理性	(166)
第四章 法治社会的反思	(177)
○犯罪：法治社会的阴影	(177)
○扭曲法治的律师制度	(194)
○倾斜的法治权力架	(203)
○莫衷一是的法治观念	(211)
第五章 受制的人类智慧	(217)
○悲剧的诞生：科学的目的与应用间的对抗	(218)
○科学：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杠杆	(224)
○奥本海默冤案：资本对科学的戕杀	(233)
○爱因斯坦论资本主义	(240)
○维纳：控制论排拒资本主义	(249)
○贝尔纳：科学反对资本主义	(256)
第六章 现实与心灵的魔幻	(263)
○“病态的时代病态的书”	(264)
○冷酷现实的折光	(272)
○传统准则与现代社会的冲突	(277)
○西方社会精神崩溃的“史诗”	(279)
○一面光怪陆离的哈哈镜	(282)
○活着还是不值得活着	(287)
○20世纪的精神畸形儿	(294)
○梦魇的世界	(296)
第七章 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病症的诊断书	(302)

○传统理论的弊端及其消解·····	(302)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308)
○现代社会的“富裕病”·····	(313)
○单向度与攻击性·····	(315)
○精神生活匮乏症·····	(321)
○对“社会性格”的诊断·····	(325)
○“社会性格”面面观·····	(330)
○新型的极权主义·····	(335)
○对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批判·····	(340)
○社会病态诊断的得失·····	(344)
第八章 人类困境：资本主义的罪恶后果·····	(350)
○南北不平等关系·····	(351)
○生态危机与绿色运动·····	(360)
○自然资源：资本掠夺的极限·····	(370)
○全球问题与社会主义·····	(378)



## 第一章 困扰民主制度的幽灵

纵览20世纪的历史长卷，西方人对其民主制度的看法，呈现为一幅复杂多变的图景。

本世纪初，是西方人对其民主制度怀有朴素感情的阶段。1906年，加拿大政治学家斯蒂芬·利科克宣称：民主统治的原则已如此牢固地确立起来，以至必须以这个原则作为建设未来国家的基础。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胜利，西方人对其民主制度更是充满了信心，认为现在的世界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危害他们的民主制度了。当时，美国与西欧这些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更加巩固，民主制度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发展。虽然苏维埃俄国作为大战的政治后果之一，也在世界上建立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的新社会制度，但是许多西方人对此并不以为然，很多人把它看作一种偶然的例外，并相信它迟早会失败，而最终将回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轨道上来。

因此，当时尽管有许多西方政客大造“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的舆论，为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制造借口，但仍有众多的思想理论家不为这种宣传伎俩所动，乐观地断言世界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无忧无虑的普遍民主时代，就像80年代西方有人预言“21世纪是西方民主的世纪”一样。

然而，一次大战后不久，二次大战前后的政治事实，却无情地搅碎了西方人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诸种罗曼蒂克的预言与梦想。

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创立的社会主义不仅在苏联牢固地扎下了根,而且从东欧到亚洲还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一种世界性进程,从而使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统天下和支配地位,都成为地地道道的一种历史的陈迹;另一方面,即使在西方国家的范围内,人们对资本主义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竟然发动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对民主制度在德、意、日等国向法西斯独裁和军国主义统治的演变,对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中所出现的政治、经济的严重不平等现象等都感触良深。本世纪初,那种对西方民主的理想化的信奉已经严重动摇,有的讥喻反抗,有的悲观沮丧,更多的则为之谋划各种改良的方略。但是,即使是最冥顽不化的辩护士,也不能再以完全颂扬西方民主制度的面目出现,而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西方民主制度的痼疾,并为此而困扰不堪。

进入80年代后,凭借着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利用科技革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利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和进行反思与改革的机会,西方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大言不惭地宣告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和21世纪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未来”。但是,所有这一些并不能祛除笼罩在他们心头的困扰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幽灵。即使从西方思想家的最保守、最乐观的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议论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并不能消除他们自己的心病,21世纪决不可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世纪;现实的社会主义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要解决当代世界所遇到的重重挑战,却仍然非它莫属。

## ○领袖民主与科层统治

马克思·韦伯是一位倍受西方学者称颂的、以博学著称的德

国社会学家，曾先后在柏林大学、弗莱堡、海德堡和慕尼黑大学担任教授，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在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已出版的著作被人遗忘，但是，战后西方的“韦伯热”却使其备受哀荣，甚至被人被誉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然而，就韦伯的政治思想而言，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看法，却是相当悲观的。这在韦伯的科层化理论及其卡里斯玛式的“领袖民主”论中，有着突出的反映。

**1** 按照韦伯自己创立的以“理想类型”为核心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作为人类发展方向之一的现代化过程，也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反映在人类行为方式上就是理性的行动逐渐取代非理性的行动，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及管理方式的合理化。

围绕着合理化即现代化这一主题，韦伯将人类社会行为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合法统治，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

(1) 传统型统治。它来源于神圣的传统，统治者掌握权力的根据是世代沿袭的惯例。统治者自认为“君权神授”，其与被统治者之间是主仆关系，忠诚的含义就是被统治者服从并效忠于统治者个人，“人治”是其突出特征，家长制、世袭制、封建制是其三种具体形态。

(2) 卡里斯玛型统治。“卡里斯玛”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神的赐予，原用来描述巫师、术士、先知这类宗教领袖。在韦伯著作中的卡里斯玛型统治指的是以卡里斯玛领袖为中心的统治形式。卡里斯玛型领袖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与特殊威信，能够在社会危机时期为人们指明希望之路，以自己的先见、品格和能力唤起大众的忠诚和追随，大众和追随者则对这些非凡领袖、救世人物表现出一种盲目的崇拜和信仰。在卡里斯玛统治中，一切事情

都由卡里斯玛领袖决定，没有任何稳定秩序，亦无固定的合理等级结构体制和正常程序，因而它是非常态的，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是一种更为纯粹的“人治”。因此这种统治类型与领袖个人作用密切相关，所以一般只能存在于初始阶段，无法保持稳定，终将转化为传统型、法理型或一种混合的统治类型。

(3) 法理型统治。它建立在理性和法律的基础上，一切权力、权威均来自于理性和法律原则，是一种法治形式。在这种统治形式之下，无论是什么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领袖、官员和普通公民都要忠实于法律，并且只对法律负责，因而是一种法律的体制而非个人的体制。法理型统治的典型形式是官僚制或科层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2** 所谓科层制，系指一种具有专门化的功能，具有固定规章制度、权威分等、工作效率最高的现代行政管理的组织制度，是现代西方基于形式法律的国家管理体制。在韦伯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奠定了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化大生产导致大型社会经济组织的产生，也意味着在各个领域实行科学而精细的专业化分工。因此，管理事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比前资本主义社会繁重和复杂，在客观上要求创设新型的与此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体制及其合法统治方式。这就是科层制及其法理型统治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并必将取代传统型、卡里斯玛型统治及其管理体制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韦伯指出：科层组织摒弃了个人感情色彩，完全代之以一种形式化、程序化、制度化的工作关系，人只是其一种职能载体，因而具有鲜明的非人格化特征。从技术和效率的角度看，虽然科层制具有严密（通过等级结构进行控制，按专业化标准进行权力分层，职位分等，层层节制，环环相扣），合理（专

业技术知识居中心地位，任何规定都是详细具体的，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精确、迅速、统一、协调、节约、高效等优势），稳定（管理的任何程序都来源于法律，摆脱了对长官意志的依赖和工作人员的随意性）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科层制本身也具有与民主制度的价值体系不相容的致命弱点。他认为：合理化、科层化与非人格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科层组织中，人是没有人格的人，是庞大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具有退化为机器人的趋向。因为科层制只追求形式上的合理性，强调效果和目的，把“技术最优”作为首要价值目标，视文官为私人企业家执行部门中的技术干部，“铁面无私而类似机械”<sup>①</sup>，而忽略了人的内心情感上的东西，直觉、本能等非理性的因素必然深受压抑。因此，德国学者蒙森指出：从科层制的角度，韦伯把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设想为压抑以至丧失个性的“新的受奴役的铁笼”，“在此之中，一切价值合理的社会行为都将被庞大的官僚结构以及形式合理的法规所编织的紧密网络所扼杀”，<sup>②</sup>从而严重地侵蚀着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础。

而且，韦伯的悲观主要并不在于他对科层性的非人格化的特征的了解，而是来自他对科层制的僭权趋向的担忧。

在韦伯那里，所谓科层组织是一个技术工具的主张，只是从纯粹“理想型”角度来讲的。但是，他同样很清楚，实际生活中的科层制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具。这不仅表现在它远远不是独立不羁的，而受到社会阶级结构的制约，而且表现在它本身具有僭越其行政功能的动力和倾向。官僚从未作到没有憎恨与激情，而是一支挟带利益和价值的社会力量，它本身造成的社会后果越

---

<sup>①</sup>戴维·比瑟姆：《马克思·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凡引自该书不再作注）。

<sup>②</sup>蒙森：《官僚制时代》，牛津1974年版，第57页。

过了其工具成就。作为一个权力群体，它本身具有影响政治系统目标的能力；作为一个有地位阶层，它客观上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具有一种实际上偏离其正当功能的非分的社会职能：科层组织僭取原属于政治家的功能的越轨现象。

科层制僭权趋向的发展有几方面的表现：其一，在同议会打交道时，设法削弱议会的权力和重要性，走走议会的过场而同各利益群体直接打交道。因为文官人员在其“官职荣誉”感的作用下，往往觉得自己处理公务的资格和能力是议员们所无法比拟的，任何一个居于普通权位上的官吏都自认为比议员、政治家高明得多，而将议会看作“自负者夸夸其谈的场所”。其二，出于以上态度，文官官吏以“超然于党派之上”的、公允的、真正民族利益的解释者自居，扩展其在政府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提高其地位，使作为群体的科层组织成为独立王国。其三，科层制的独特的权力基本来源于技术优势或知识——包括技术专业和来自于为官经验中的更为一般的知识，即专业知识和官场知识。其四，以保密扩展力量。秘密是科层组织的基本特征，对官吏来说，最重要的权力手腕是将官场知识变为机密知识，“并以‘臭名昭著’的‘官方机密’名义为借口。这是保障行政免受外界控制的简明方式”。这种态度特别明显地表现于科层组织同议会的关系中。政府机关要蒙蔽议会谋求自身利益，他们势必要抵制发言人——如通过咨询委员会——帮助议会获取信息。科层制固有的保密与议会活动的公开形式是针锋相对的。而且正是不予公开的知识使得科层组织不仅成为有效的行政工具，而且成为一种为所欲为、自行其是的潜在力量，使政治统领难以控制科层组织，除非他们同样拥有下属的专业知识，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科层部门僭越咨询和执行功能，进而控制决策的趋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政治统领在起作用的地方，实际上

却是科层部门在毫无控制而又不负责地享用特权和左右决策。

总之，科层制的官僚政治凭借其对于选举产生的政治家的种种技术优势，在行政管理的公正无私的幌子下，支配或强烈影响政策，政府的部长们（由选举获胜的执政党委派的）总是有变成他们自己部门的雇员的危险。从而不但给科层制，而且也为议会民主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科层官僚与政治家所擅长的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首先在于责任性的不同，官僚只以政策咨询和执行者的身份对上级负责；他对政策本身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在重大事情上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一旦政策被决定，他的责任就是忘我执行，宛如它符合自己最深的信念一样。没有这种“纪律”、“自我克制”和“自愿服从”的品格，整个科层部门就会崩溃。相反，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是在论争和辩论的肉搏中成熟的（官僚不适于这类事情，且有责任去避开党争），他对所实行的政策负私人责任，因为这关系到他对选民的承诺和能否再得到选民的支持。因此，“为个人权力而斗争并为此承担个人责任，这就是活生生的政治家”。在这种奋斗过程中，他将必须做出承诺，不得不牺牲局部，以顾大体。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真正政治家。政治家品质正是这样为假定的私人责任所刻划，与训练有素而尽职的官僚恰好相反。

其次，二者不仅责任性不同，而且他们活动的完整性格也不一样。文职官员是在强迫性的，通常秘密行事的组织中工作，其任务是发布和服从命令，循规蹈矩。而相反，政治家的角斗却是在同其他群体和其他观点的冲突中为争取自愿的支持者而展开的公开斗争。官僚参照规则和技术专业要求判断一个情境；政治家却根据能得到多少对政策的支持的估计去判断。而终生在执行升迁规定过程中的官僚无缘发展这些品质，尽管他可能很擅长他的

职务。因此，改变政治角色乃是官僚的严重失范。无论怎样，一个科层工具，在它想超出其限度时，它的完善进程就会停止，议会民主制的法理型统治也就会因之而瓦解。这就是韦伯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层制的要点；也正是他对于“科层理性的矛盾心境”之所在。

韦伯为科层制归纳出的两重性——它对于当代社会处理复杂事务的必要性以及它僭越行政工具职能的趋势——使他得出了当代政治的主要问题：如何使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日益扩展的科层制既发挥其效率最高的技术优势，又使之约束僭权行为服从政治控制，而不至于吞没必须以之为统治工具的议会民主制。

在这里，作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韦伯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认为社会主义能走出科层理性的发展“怪圈”，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认为科层统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不可避免，依然不能改良科层制的反民主性格，而且还会使之更加严重。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管理系统提供了与国家相抗衡的科层组织，两种官僚界域的紧张是保持个人自由的重要因素。而社会主义取消工业科层和政府科层之间的紧张并将之纳入一巨大的行政等级中的结果，却使科层制的威胁更严重了：单一的科层等级所统治的社会，它将破坏一切自由的可能性，即所谓“废除了私人资本主义，国家科层组织就会独揽统治权。现在，政府的科层组织和私人企业的科层组织至少在原则上是在互相抗衡和互相监督，而到那时，二者将被铸进单一的行政等级之中”。

因此，马克斯·韦伯仍坚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寻找挽救资本主义政治统治体制的出路，具体方案就是将卡里斯玛型的民选领袖与科层制结合，使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能具有一种既能利用科层制的技术优势或工具价值，而又不为其所蒙蔽和操纵的力量或能力。



3

如何使科层组织服从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控制呢？韦伯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能够驾驭科层部门遵循政治方向的政治家。即运用卡里斯玛的革命性力量，凭借卡里斯玛领袖的个人魅力，冲破科层制的牢笼，不断打破科层制所造成的沉闷局面；发挥卡里斯玛的作用，使卡里斯玛领袖凌驾于科层组织之上，成为控制与驾驭科层制的力量。这就是韦伯对于议会民主制及其法理型统治支柱之一的科层制出路的最后抉择，也是其科层化理论的最后结论。

在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反映了韦伯的悲观主义民主观。一方面，他显然认为民主是乌托邦，并且认为民主与降低效率是一致的。因为“夸夸其谈”的议会民主制与高效率的科层制在他看来是对立的，而且是被后者操纵的和“僭权”的对象。这种无条件地将民主与效率对立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只有以个人专制的卡里斯玛领袖才能统御具有自我权力扩展倾向的科层制，主张实行专制的、人治的科层制，几乎已达到了要否定民主与法治的程度。这是韦伯民主观的最悲观的所在，也是他思想体系的致命弱点，更是他否定社会主义能解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而且，韦伯对议会民主制前景及内在矛盾发展趋向的悲观估计还不仅仅立足于他对政治的考察，而且还有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私人企业，尤其是垄断资本的发展，是专制科层制最为根本的动力和最为深厚的基础。所以，人的自由的被压抑，民主制地位的被僭越，是不可扭转的，真正的理想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是没有出路的。除非它求助于专制的、人治的卡里斯玛统治的“革命性”力量。虽然他也论证了英国式的“强议会制”是产生和训练卡里斯玛型政治领袖（要赢得民选，政治家必须使自己具有非凡的魅力）的最好基础，但他终